

小泉八雲與近代中國

◎ 劉岸偉

對於今天大多數中國讀者來說，小泉八雲（Lafcadio Hearn，1850–1904）這個名字已經十分陌生。這位1850年出生的作家曾與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馬克·吐溫（Mark Twain）呼吸同一個時代的空氣，在同一個時代寫作。不過和他們幾位相比，小泉八雲則更顯得默默無聞。然而從清末算起，在近半個世紀的中國近代文化史上，小泉八雲卻扮演了很少有人可以比擬的角色。比較新近出版的一部傳記《徘徊的魂靈》的作者喬納桑（Jonathan Cott）用令人興奮的筆調寫下了他的讀書體驗：「不久我就發現拉夫卡迪奧·赫恩不只是僅僅在日本發揮了才能的隨筆家，就像對他的陳腐的批評所說的那樣，只是一個矯飾浮華的散文作家，他不僅作為新聞記者、而且作為小說家及批評家、翻譯家、民俗學家、英國文學學者、日本佛教的闡釋者都留下了輝煌的業績。」¹

這種多方面的才能或許可以部分說明小泉八雲在中國的命運。他的作品為中國讀書界廣泛接受大概是在30年代。隨著時代變遷、時間推移，人們在不同的氛圍下、在不同的文脈中閱讀這位作家。譬如作為眷愛日本文化的親日家，作為具有抒情詩人般同情心的東方文化的闡釋者，作為於人生與文藝持有熾烈的熱情而又能娓娓道來的文學批評家，作為刻畫細膩、文辭瑰麗極富於感染力的散文作家，作為鼓吹中日親善宣傳國策文學的裝璜招牌等等²。分析、解讀小泉八雲與近代中國的關係，其意義不僅僅在於考證作家與文本的流傳。他那些在世紀之交寫下的寓意獨特的文明批評，今天讀來依然雋永有味。而考證同時也具有某種文化史的意義，可以使我們再次回顧近代中國人曾經面臨、今天仍舊揮之不去的疑問與抉擇。重讀之所以耐人尋味，道理也就在這裡。由於篇幅所限，本稿只截取其中若干側面作一個初步探討。

一 漂泊的作家

小泉八雲原名拉夫卡迪奧·赫恩，1850年6月27日生於希臘伊奧尼亞群島中的桑塔莫拉島（現在的勒夫卡斯島）。當時該島受英國統治，赫恩的父親就是英國守軍中的一名愛爾蘭軍醫，母親則是希臘婦女。據說在其父系血統裡有吉卜賽人的血脈，赫恩常以此自豪。五歲時因父母離異，遂被父親一位富裕的姑母收養。1863年赫恩進入薩利郡達拉姆市郊外的聖卡斯帕特神學院（現在的達拉姆大學）學習。少年時的赫恩快活頑皮，作文成績總是名列前茅，也是惡作劇的能手，在一次遊戲中被飛來的繩結誤傷左眼以至失明，這在他一生中都留下了陰影。不久姑母破產，赫恩曾被送往法國學習，由此打下了法文的基礎。但其後他不得不自行謀生，19歲搭乘移民船隻身遠渡美國，在新大陸生活了21年，渡過了人生中最困苦的時期，同時亦是為生存為文學創作奮鬥拼搏的時期。生活在社會的底層，赫恩目睹了基督教、大工業文明的美國社會種種陰暗與腐朽，這些體驗在他的人生觀上刻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

1890年，步入中年的赫恩作為紐約哈帕出版公司的特約撰稿人乘坐阿比西尼亞汽輪前往日本，4月4日抵達橫濱。當時他來到遠東這個神秘的國度只是為了尋求創作的靈感及新的文學素材，未曾設想就此結束了半生的漂泊而終老日本。經著名語言學家、《古事記》的英譯者張伯倫（Basil Hall Chamberlain）教授的推薦，赫恩在島根縣松江市普通中學及師範學校得到了一個英語教師的職位，從此開始了在日本生活、寫作的後半生。

島根縣古稱出雲，是日本古代神話的發祥地。松江地處偏僻，明治時期歐化的風潮還未曾波及，故一般民眾生活中仍然保留著古樸自然的風貌。赫恩為這種樸素的民俗及庶民日常中的宗教情感深深打動。根據在松江的經歷及素材，赫恩寫成了來日後的第一部作品《陌生日本的一瞥》。在松江生活期間，赫恩與士族小泉家的女兒節子結婚，不久長男一雄出生。為了使自己去世後，遺產能夠留給在日本的妻兒，他決定入小泉家為養子，入籍日本，取名小泉八雲。從1890年來日到1904年去世止，他在日本生活了十四年。在這期間又幾經輾轉遷移。1891年底小泉八雲告別松江，移至熊本第五高等中學任教直到1894年10月。此時中日甲午戰爭事發，小泉八雲一方面讚賞日本人舉國一致投入戰爭的熱忱，同時亦看見新興日本露骨的功利主義、知識官僚階層的淺薄、國粹主意的反動，因而他的日本觀亦發生了深刻變化。辭掉教職後，小泉八雲遷至神戶，曾一度擔任一家英文報*Kobe Chronicle*的主筆，但因眼疾加甚遂作罷。在神戶期間，他完成了兩部重要著作：《來自東方》和《心》。

1896年再次經好友張伯倫的推薦，小泉八雲應邀赴東京帝國大學擔任文學部講師，教授西洋文學，為時六年。1903年，小泉八雲被東大解僱，此後曾準備赴美講學，但因故未能成行。1904年初，小泉八雲接到早稻田大學的招聘，至同年9月在早大講授「英國文學史」。9月26日因心臟病發而去世。

小泉八雲的寫作生涯以赴日前後為界，可以分為美國與日本兩個時期。在美國他先後於西部奧亥俄河畔的辛辛納提和南部都市新奧爾良做報館新聞記者，期間寫下了大量報導、特寫、隨筆、人物素描、社會短評、諷刺雜文以及有關法國當代文學的翻譯、批評文字。他是最早向美國讀者介紹了莫泊桑、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的。這些文字在他去世以後經愛好家莫德爾（Albert Morde11）收集整理，其中一部分已經結集出版，像《東西文學評論》（*Essays in European and Oriental Literature*, 1923）、《美國雜錄》（*An American Miscellany*, 1924）、《西洋落穗集》（*Occidental Gleanings*, 1925）。

小泉八雲生前在美國出版的著作有以下幾種：1884年刊行的《奇異文學落葉》（*Stray Leaves from Strange Literature*），內容大都取材於東方的逸聞、傳說。《中國靈怪故事》（*Some Chinese Ghosts*）出版於1887年，這部小書收錄了六個短篇，大多根據法譯本改寫潤色而成。1890年3月，在來日前夕，哈帕出版公司刊行了他的紀行作品《法屬西印度的兩年》（*Two Years in the French West Indies*）。這是根據在法屬西印度群島的生活體驗寫下的紀行散文集，包括人物素描、批評小品、體驗報告，體裁豐富而多變。這幾部著作很可以代表或暗示小泉八雲來日後的創作特點及傾向³。

日本時期可稱做小泉八雲寫作的豐熟期，主要作品有：《陌生日本的一瞥》（*Glimpses of Unfamiliar Japan*, 1894）、《來自東方》（*Out of the East*, 1895）、《心》（*Kokoro*, 1896）、《佛田的落穗》（*Gleanings in Buddha-Fields*, 1897）、《異國風物及回想》（*Exotics and Retrospectives*, 1898）、《靈的日本》（*In Ghostly Japan*, 1899）、《陰影》（*Shadowings*, 1900）、《日本雜記》（*A Japanese Miscellany*, 1901）、《骨董》（*Kotto*, 1902）、《怪談》（*Kwaidan*, 1904），以及晚年

日本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日本：一個解釋的嘗試》（*Japan: An Attempt at Interpretation*, 1904），幾乎每年一冊。小泉八雲作為文筆家的名聲亦以這一時期的著作奠定。

最後還應提及的是，小泉八雲去世後，他在東京大學的英文學講義經門生整理在紐約出版，即哥倫比亞大學阿斯金（John Erskine）教授編纂的兩卷本《文學的解釋》（*Interpretations of Literature I, II*）。此書中的不少章節在1930年代曾被譯介到中國。小泉八雲並非學者，而他以創作家的感性評詩論文，亦可見其批評家、文學史家的力量與見識。

二 東方與西方

1923年1月，《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一號上發表了一篇出自胡愈之手筆、題為〈小泉八雲〉的文章。此文的開頭列舉了幾種研究東方文化的西洋人，分析了他們的種種動機和心理，指出了這幾種東方學研究的界限：實際上不可能真正了解東方，然後引出了這樣一段⁴：

西方人真想了解東方，第一必須具有客觀的無利害的態度，第二必須具有抒情詩人的同情的心。要是不然，單從物質方面去追求，是不能捉住東方人的心的。在歷來到過東方的許多西洋觀察家中，能和東方神契靈化的，只有現在所介紹的Lafcadio Hearn了。他是對於西方的「東方的解釋者」，他是從情緒方面解釋東方，而不是單從物質方面解釋的。所以到了後來，連他自己也東方化，變成了一個慈祥文秀的小泉八雲了。

胡愈之從東西方文化融合這一視角捕捉小泉八雲東方研究的特色是頗有見地的，1896年3月《心》由紐約霍頓·彌福林（Houghton Mifflin）出版公司刊行，其扉頁題目下面印著這樣一行副標題：日本人內心生活的暗示和共鳴（*Hints and Echoes of Japanese Inner Life*）。與其他西洋觀察家比較，除了研究心態和關注對象不同外，小泉八雲的獨特之處還在於來自社會底層的觀察與體驗。

小泉八雲來日前曾十分崇拜法國作家羅提（Pierre Loti, 1850–1923）。羅提原名為Louis Marie Julien Viaud，本是法國海軍軍人。1885年曾隨法國遠東艦隊參加中法戰爭。停戰後兩國締結了清法修好條約，羅提亦隨艦隊至長崎休整，於是第一次踏上了日本的國土。記錄這次在長崎一個夏天生活的自傳體小說《菊子夫人》成了羅提代表作之一。羅提很有藝術天分，他利用在海軍服務的機會，遍訪世界各地，筆錄了許多異域風光並寄給雜誌社發表，從而開始了寫作生涯。1880年第二個作品《羅提的結婚》一舉成名，成了世人矚目的新浪漫派作家。1884年11月赫恩寫下了一篇有關羅提的評論（"The Most Original of Modern Novelists"），稱讚羅提為「現代法國最獨創作家」，對其多方面的藝術天賦、強烈的感官性、敏銳的觀察力推崇備至⁵。在寫給友人克萊比爾（H. E. Krehbiel）的信中說：「再也沒有像他那樣給與我如此影響的作家了。」⁶羅提五光十色的官能性、色澤鮮明的風土描述，以及詩一般的華麗文體對赫恩確有強烈的魅力，但作為作家在觀察事物的本質上，兩人並沒有甚麼共同點。就像赫恩的傳記作者史蒂文生（Elizabeth Stevenson）指出：辨別兩者不同的試金石則是日本。1890年赫恩來到日本時，他還未失去對《菊子夫人》的敬愛，但不久他就發現了完全不同於羅提所看到的日本⁷。

羅提的觀察僅僅停留在日本社會生活的表層。身居白種人優越的位置，他的視線始終未能透

視到異質文化社會的底層。晚年的小泉八雲在寫給張伯倫的信中表露了對羅提崇拜的幻滅⁸：

對我來說，羅提曾一度是位凝視著大自然的光華奪目、閃電般燃燒的靈魂，並在其最深沉最強烈的靈感下創作的人。那時他還很年輕。以後他就失去了色澤與光彩，只剩下消磨殆盡、索然無味的神經；進而這位詩人就變成了病態的矯飾的那種現代法國人了（1893年2月18日）。

小泉八雲十分推崇《朝鮮》（Choson）、《遠東之魂》（*Soul of the Far East*）的著者羅威爾（Percival Lowell），並在寫給張伯倫的信中敘述了羅威爾的書如何陪伴他旅行，以及從作品中感到的喜悅（1891年5月22日）⁹。不過小泉八雲明確意識到彼此方法的不同。他同意張伯倫的看法，即羅威爾未能親近一般庶民，而自己正是要躬行羅威爾未能做到的方法：入鄉隨俗，採納日本的衣食住行、習熟其禮儀風俗，才能體會到一般民眾的「心」（こころ，1891年9月4日）¹⁰。「我試圖從底層去探索他（羅威爾）居高臨下所觀察到的東西」（1893年1月14日）¹¹。胡愈之所指出的也正是這種區別，不過他沒有舉出具體事例說明。

將小泉八雲與西人觀察家作具體比較的是胡先驕。1924年4月，《學衡》第二十八期登了他的一篇〈旅程雜述〉，記述民國十二年（1923）7月重渡太平洋旅次的見聞，其中一節談到日本長崎：「海程之第三日傍晚。見遠山如掇黛。海水澄碧如琉璃。蓋長崎已在望矣。」¹²七年前他曾遊歷到此，但這一次卻沒有上岸，為的是保留昔日美好的記憶，使其不為日常生活的蕪雜醜陋打碎。進而則想到了浮光掠影的旅程見聞與久居深入的觀察之不同。胡寫道：「遊歷之勝於久居者。不以其所引人注目者。在在皆極新奇。雖凡近醜劣之景物。皆能別呈驚愕詫怪之感而不生厭惡之心耶。」

遙望著長崎的風物，胡先驕不覺聯想到羅提：

余方讀羅提艦長之菊娘傳。余所見之長崎。果羅提所見之長崎乎。今日之長崎市民。果有異於羅提所見之長崎市民乎。抑當明治初年羅提所居之長崎。已非今日歐化之大日本帝國之長崎乎。無論其實際究竟之如何。吾敢斷言菊娘傳中之長崎。未必為真正之長崎。而「菊娘」與其鄉黨鄰里。亦不足代表日本民族也。今試以羅提與極崇拜羅提之愛爾蘭文豪小泉八雲較。即見羅提目中之日本非實際的。而為主觀的。

胡先驕比較了他們兩人對待東方民族的不同態度，認為羅提的偏見來自於「暫種天驕之故態與英人自許以『宰制世界』、德人之自命為世界最高之民族」的誇誕，而小泉八雲才是「真慕東方者」，「其求知東方之方法，根本上與羅提異」。

小泉八雲從底層觀察日本社會的方法，與今日文化人類學、民俗學的方法頗為相似。做了小泉家的養子之後，他便與一個二十多人的大家族朝夕相處。他細緻觀察族中的許多成員，並在寫給友人的書信中做了直率、饒有興味的描繪。這些書信本身就是一種「參與觀察」的記錄。當然小泉八雲對日本的認識也經歷了一個由表及裡的過程。從初期的《陌生日本的一瞥》到晚年的《日本：一個解釋的嘗試》，小泉八雲的日本觀從浮薄漸至沉穩，從情緒的宣泄漸至理智的分析，產生了深刻的變化，但卻有一個低音旋律貫穿始終。即是對無可挽回的、行將滅亡的舊日本的惋惜和惆悵；對無法阻攔的、咄咄逼人的新日本的厭惡和不安。於舊日本中，他寄託了自己所追求的道德理想，而新日本的背後，所潛伏的無疑是吞噬人類良知、不道德的西洋基督教文明。所以說小泉八雲的日本論是與對西方社會的批判互為表裡的。考察這種文明批判，我們可以從他的人生經歷中找到線索。

1893年8月30日小泉八雲寫給張伯倫的信中有這樣一段話¹³：

我並非沒有意識到天主教國民眾信仰的魅力。你知道我總是懷著親昵的感情敘述這些。但是我無論如何也不能將被稱做基督教的東西與我在這世上有生以來所經歷的那些偽善、殘忍、邪惡分開；與那些司空見慣的惡習、司空見慣的鬱悶、那些醜惡、骯髒的禁欲苦行、陰沉臉、權謀術以及無恥的愚弄兒童心靈的所作所為分開。

在這些激忿之辭的背後，可以想見他苦澀的體驗。

胡先驕在〈旅程雜述〉中批評羅提「賤視東方民族」，文辭雖不似小泉八雲激烈，文意則一脈相通。固然胡先驕對西洋文明的批判未免偏頗，但卻反映了當時中國思想界的一種氛圍。歐戰後的現實迫使人們去思考應當如何看待東西方兩種文化，而這種反思又與西方世界的思潮不無關係。胡愈之的文章一開頭就提到這一點。

與「二胡」幾乎同時注意到小泉八雲的另一位中國人就是辜鴻銘。1924年辜鴻銘應邀赴日講學，同年《大東文化》7月及9月號上刊登了他的論文〈中國文明的復興與日本〉，其中有一段寫道¹⁴：

許多人認為日本人缺乏德義，倘若僅以日本人法律上的文辭字面來看，或許可以這樣說。但實際上日本國民在德行上非常卓越，因此歐洲人中，像拉夫卡迪奧·赫恩、阿諾德，以及法國學士院會員布里烏（譯音——筆者）這樣高尚的人物才能了解日本人的真品格。

辜鴻銘生於1857年，早歲留學歐洲，精通西文，返國後卻醉心儒家文化。辜氏為人論事雖屬偏歧，但其一生在近代化後進國具有典型意義，即所謂「生平長於西學，而服膺古訓」。在這一點上，《東方雜誌》的杜亞泉、《甲寅》的章士釗，以及《學衡》諸公可看作是辜氏的同路人。閱讀日本近代思想文化史，人們發現明治、大正時期的教養層、一些主要的作家和文人大都經歷了先而精研西學，最終回歸傳統的人生曲線。在世紀的轉換期，依據自身的經歷，敏銳地察覺到這一點並將其作品化的正是小泉八雲。

小泉的代表作《心》，其中第十章是一篇長文，題為〈一個保守主義者〉（"A Conservative"）。描寫一位在封建制度下出生的舊武家子弟如何皈依基督教，然後出國留洋，在目睹了西方社會的種種現實之後，又如何回歸祖國的傳統文化。人物的原形是小泉八雲的摯友雨森信成，亦可看做是小泉八雲的化身。文中借人物之口表現的思想觀點、縱觀東西兩種社會的觀察，可以說是小泉八雲個人體驗的總結。他未賦予人物姓名，只採用第三人稱"He"，因而倒可以當做一篇思想論文來讀。下面一段譯自其第七節¹⁵：

然而西洋科學，他知道其邏輯是無可論破的，卻使他相信它那文明的力越發膨脹，而隨之而來的世界苦則如不可抗拒、在劫難逃、漫無邊際的洪水。日本不得不學習新的活動形態、必須習熟新的思維方式，不然就會徹底滅亡。日本別無選擇的餘地。於是所有懷疑中的最大疑問向他襲來，這疑問是所有賢哲都曾面對的：這宇宙究竟是道德的麼？對於這個疑問，佛教給予了最深刻的回答。

但是宇宙的進程無論道德與否，只不過是依據微不足道的人的情感來判斷的。而他心中則有了一個任何邏輯也不能動搖的信念：即人應當以其全部力量追求最高的道德理想，以至未知的無窮。為此哪怕與日月星辰反其道而行。日本迫於需要，不得不去掌握外國

的科學，從她敵手的物質文明中採納許多東西。但是無論如何急迫，也不能使她將是非正邪的觀念、義務與名譽的觀念完全拋至腦後。漸漸地，在他心目中，一種決意形成了。這一決意在以後的歲月裡使他成為一名領袖、一名教師。這個決意便是要用盡他的全力為保守古代生活中所有最美好的而奮鬥，無所畏懼地反對輸入那些於國家的自衛並非根本的、無助於國民自我發展的任何事物。他也許會歸於失敗，但他並不覺得是恥辱。不過他至少總能從那漂流的沉船上救起一些有價值的東西。

作為紀錄明治時期日本知識人精神風貌的珍貴文獻，〈一個保守主義者〉至今仍不失其思想文化史上的意義。小泉八雲逝世二十年之後，他的著作在中國得到共鳴，這反映了當時一種普遍的世界性思潮。然而這種思想資源在中日兩國的歷史命運畢竟是不同的。〈一個保守主義者〉顯示了對傳統與西學的深刻觀察和強韌的思索，並獲得了眾多後裔；而在中國，如辜鴻銘所為，戲劇性掩蓋了思想性，至今似乎還在扮演著喜劇角色。

三 「親日派」

根據迄今發現的資料，最早提及小泉八雲的中國人是周作人。1916年，周作人在《叢社叢刊》上發表了一篇雜感〈一簣軒雜錄〉，其中有幾節介紹了日本的盆踊、浮世繪和俳句。這可視為周作人日本研究的早期作品。在俳句一節中他提到了小泉八雲¹⁶：

英人赫倫，後歸化日本，從妻姓，曰小泉八雲，著《日本雜記》，其《小詩》一章中有云：「日本詩歌之原則，與繪畫相合。歌人用數單字以成詩，正猶畫師之寫意，淡淡數筆，令見者自然領會其所欲言之情景，其力全在於暗示……」其言頗透辟。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周作人結束了六年的留日生活，攜日籍妻子回到故鄉紹興。回國後周作人仍舊十分關注日本社會文化的動態，經常從日本訂閱書刊，小泉八雲的著作自然引起了他的注目。查周作人日記1912年10月條，記錄了他從相模屋訂購《國民性十論》、《白樺》、《學鐙》、《小林一茶傳》、《俳句大辭典》等書刊。10月29日條中有如下記述：「小泉八雲L. Hearn著作當購讀但以入日本後者為重。」1913年2月1日條記從相模屋收到「Aspects of Child Life & Education Hearn: Kokoro. 又Thomas: Hearn各一冊」。2月6日條記：「閱Hearn傳微雪旋止晚閱Hearn傳了又所著《心》數章」¹⁷。周作人閱小泉八雲，其目的明確，即側重1890年以後所寫下的日本題材的著作，作為自己研究日本的借鑒。

1920年10月23日《晨報》第七版刊登了周作人的一篇文章，題目是〈親日派〉。在當時的中國，「親日派」幾乎就是賣國賊的代名詞。1919年4月，歐戰媾和會議在凡爾賽召開，公理未能戰勝強權，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省的權益被日本獲取。消息傳來，群情激忿，遂爆發了五四反帝運動。新文化運動以來，周作人在文化界一直居顯著位置。他曾反覆強調日本研究的必要，在這期間翻譯、介紹了日本近代文學以及「新村」的社會實踐。正因為如此，「親日派」一詞對他來說含意非同尋常。不過周作人的解釋出人意料，他一方面批駁了出賣中國民族利益的小人，同時賦予這個詞一層新的內涵¹⁸。

中國的親日派，同儒教徒一樣，一樣的為世詬病，卻也一樣的並沒有真的當得起這名稱的人。

中國所痛惡的，日本所歡迎的那種親日派，並不是真實的親日派，不過是一種牟利求榮的小人，對於中國，與對於日本，一樣的有害的，——一面損了中國的實利，一面損了

日本的光榮。

我們承認一國的光榮在於他的文化——學術與藝文，並不在他的屬地利權或武力，……中國並不曾有真的親日派，因為中國還沒有人理解日本國民的真相的光榮，這件事只看中國出版界沒有一冊書或一篇文講日本的文藝或美術，就可知道了。日本國民曾經得到過一個知己，便是小泉八雲（Lafcadio Hearn, 1850-1904），他才是真的親日派！中國有這樣的人麼？我慚愧說，沒有。

十九世紀以降，研究、介紹日本學術文藝者不僅止小泉八雲。周作人本人曾提到的就有《日本的印象》的作者、法國詩人古修（P. L. Couchoud）、寫過《日本的精神》、《德島的盆踴》的葡萄牙人摩拉藹思（W. de Moraes）以及《日本事物志》的著者張伯倫。以小泉八雲作親日派的代表，或許是因為小泉八雲在日本的名聲以及一般世人的印象。不過更重要的是周作人對小泉八雲作品的共感。

1921年5月10日《小說月報》第十二卷第五號刊登了周作人的長篇論文〈日本的詩歌〉。他系統地介紹了日本詩歌的諸種形式，長歌、短歌、旋頭歌、連歌、俳句、川柳。這在中國恐怕還是第一次。論文的一開頭，他引用了小泉八雲《靈的日本》中的一段話¹⁹：

詩歌在日本像空氣一樣的普遍。無論甚麼人都關心詩歌。誰都能讀能作，不問身份、階級。詩歌不僅僅遍在於一種精神的氛圍之中，而且實際上到處都能聽見，眼裡都能看見。

這是" Bits of Poetry "的一節。周作人直譯做「詩片」。周的譯文省略了" irrespective of class and condition"、" Nor is it thus ubiquitous in the mental atmosphere only "兩句，扼要地概述了小泉八雲的原文，接下來他作了如下的分析²⁰：

這詩歌的空氣的普遍，確是日本的一種特色。推究他的原因，大約只是兩端。第一，是風土人情的關係。日本國民天生有一種藝術的感受性，對於天物之美，別能領會，引起優美的感情。如用形色表現，便成種種美術及工業的作品，多極幽雅纖麗；如用言語表現，便成種種詩歌。

對日本國民藝術資質的指摘確是周作人論日本文化時的重要視角。登在《語絲》創刊號卷頭的〈生活之藝術〉中，有這樣一段²¹：

日本雖然也很受到宋學的影響，生活上卻可以說是承受平安朝的系統，還有許多唐代的流風餘韻，因此了解生活之藝術也更是容易。在許多風俗上日本的確保存這藝術的色彩，為我們中國人所不及，……

這種認識固然來自六年的留學體驗，但在考察周作人的日本文化論時，有一點不應忽視，即他雖在東京生活多年，但卻一直未曾有意識地去研究日本文化。他當時的時間與精力大都傾注於編纂《域外小說集》，所閱讀、收集的也都是英文著作。1909年魯迅回國後，他才開始學習日文。對日本文化的某種親昵感可以歸結為他所說的「個人性分」，基於一種直觀，意識到日本文化的獨自價值，並痛感到日本研究的必要性想必是在周作人歸國之後。聯想到他的日本論的執筆時期，這一推論亦是妥當的。對於周作人的日本研究來說，前人的業績則具有重要意義。透過小泉八雲獨特敏銳的觀察，周作人不僅以此彌補了自己見聞、體驗的不足，並且重新喚醒了他的感性，促進了他的新發現。

1926年6月22日《語絲》九十三期上發表的雜感〈酒後主語〉中，周作人再錄了六年前的文章。他為「親日派」一詞注了一個英文解釋：Japanophile，不過此時中日關係的惡化已不允許周作人懷有「愛日本者」小泉八雲的那種真摯。字裡行間透露出一種孤軍奮戰的悲愴與寂寥。

四 30年代的中國文壇與小泉八雲

1890年赴日以後不久，小泉八雲的寫作進入了一個豐熟期。根據在松江及熊本的生活經歷，他接連寫下了幾部作品：《陌生日本的一瞥》、《來自東方》、《心》。這些日本題材的著作很快引起了歐美讀者的關注。在寫給友人西田千太郎的信中，有這樣一段²²：

我的其他著作不僅在美國，在歐洲也獲得了成功。法國一流的書評雜誌（Revue des Deux Mondes）刊登了一篇評論我的長文，《觀察》、《文萃》、《泰晤士報》以及其他英國刊物也都表示善意。誠然我還不至於那麼愚蠢，把這些讚賞全當做事實。我每天越發感到自己的無知，所以比起對日本的了解毫無可言的外國評論家的讚賞，日本友人的贊同則更使我喜悅。不過有一件事讓我鼓起了勇氣。即今後關於日本不論我寫甚麼，人們在歐洲以及其他地方都會讀到它，這樣我或許能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我的第一本書正在被譯成德文。

寫下這段話時，小泉八雲是否料想到他的著作在30年代的中國亦會引起熱烈的反響。1929年小泉八雲著《西洋文藝論集》（侍桁譯）由上海北新書局出版發行。根據內容判斷，大概譯自哥倫比亞大學阿斯金教授編纂的兩卷本《文學的解釋》。此後，小泉八雲的作品被陸續譯出：《文藝譚》（石民譯注，上海北新書局，1930）、《日本與日本人》（胡山源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文藝十講》（楊開渠譯，上海現代書局，1931）、《文學講義》（惟夫譯，北平聯華書局，1931）、《英國文學研究》（孫席珍譯，上海現代書局，1932）、《文學的畸人》（侍桁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心》（楊維詮譯，上海中華書局，1935）等等²³。在單行本發行以前，不少作品都曾在《語絲》、《奔流》、《小說月報》、《東方雜誌》等刊物上登載。不難看出，其中大部分譯介側重於英文學研究及文學批評。1929年1月，《奔流》第一卷第八期上刊出了侍桁翻譯的〈十九世紀前期的英國小說〉。在這一期的〈編校後記〉中，魯迅寫了如下一段感想²⁴：

這一本校完之後，自己覺得並沒有甚麼話非說不可。但是，忽然想到，在中國的外人，譯經書、子書的是有的，但很少有認真地將現在的文化生活——無論高低，總是文化生活——介紹給世界。有些學者，還要在載籍裡竭力尋出食人風俗的證據來。這一層，日本比中國幸福得多了，他們常有外客將日本的好的東西宣揚出去，一面又將外國的好的東西，循循善誘地輸運進來。在英文學方面，小泉八雲便是其一，他的講義，是多麼簡要清楚，為學生們設想。

其實，在這以前，朱光潛也說過類似的話²⁵：

哥德曾經說過，作品的價值大小，要看它所喚起熱情的濃薄。小泉八雲（Lafcadio Hearn）值得我們注意，就在他對於人生和文藝，都是一個強烈的熱情者。他所傾向的雖然是一種偏而且狹的浪漫主義，他的批評雖不免有時近於野狐禪，可是你讀他的書札，他的演講，他描寫日本生活的小品文字，你總得被他的魔力誘惑。你讀他以後，別的不

說，你對於文學興趣至少也要加倍濃厚些。他是第一個西方人，能了解東方的人情美。他是最善於教授文學的，能先看透東方學生的心孔，然後把西方文學一點一滴地灌輸進去。初學西方文學的人以小泉八雲為嚮導，雖非走正路，卻是取捷徑。

這是長篇論文〈小泉八雲〉開頭的一番話，此文最初登在《東方雜誌》第二十三卷第一八號（1926）上，後收入《孟實文鈔》。朱光潛1925年赴英法留學，歸國後在北京大學教授西洋文學史、文藝心理學。這篇批評文字大約寫於留歐時期，行文中流露出他許多的切身感受。朱氏引證了比思蘭（Elizabeth Bisland）女士對小泉八雲書簡的讚許，頗表示同感²⁶：

他的信札大半在百忙中信筆寫成的，所以自然流露，樸質無華。他的熱情，他的幻想，他的偏見，在信札中都和盤托出。平時著書作文，都不免有所為，寫信才完全是自己的娛樂，所以脫盡拘束。他的信札，無論是繪聲繪形，談地方風俗，寫自己生活，或是談文學，談音樂，都極瑣瑣有趣。

這段話不禁讓人聯想起談論明末小品淡泊趣味，講究書信無飾雕琢的周作人的口吻。朱光潛乃是30年代京派文學同仁中的理論家，周作人與許多京派作家都有師弟之宜。他們之間的精神紐帶在文學創作上的反映之一就是對「小品散文」的追求。而小泉八雲的創作、批評與30年代「小品文」熱潮的關係，對文學史家來說，應當是一個頗具誘惑的題目。

《人生與文學》（*Life and Literature*）是繼《文學的解釋》（兩卷本，1915）、《詩的鑒賞》（1916）之後，同樣由阿斯金教授編纂，1917年於紐約出版的文學講義，其中第七章題為〈小品散文〉（"The Prose of Small Things"）。小泉八雲在此文中預示了小說這一體裁的凋落，而為「小品文」描繪了光明的前景²⁷：

未來的散文中兩個領域將會得到大力開拓，即隨筆與素描寫生文。眾所周知，在十九世紀的英國，隨筆與素描文的發展大大落後於法國。因為隨筆與素描文的作者無法和小說家競爭。可以講小說壓垮了隨筆。就好像巨大的岩石壓在草地上。倘若不搬掉這沉重的岩石，花草便不會重新生長。不過，搬掉這岩石，現在似乎只是個時間問題。小說衰退的越快，隨筆和素描文便重新開花，並受到人們青睞。在那些目光短淺的人看來，可能乏味而不足論，其實這種小品文學與小說相比，大都更具有長久的生命力，更有價值。一篇出色的隨筆有時可流傳數千年。君不見西塞羅（Cicero）的隨筆小品當今已被譯成各種語言，那卓越的文辭和思想到處吸引著人們，為人所探求嗎？

以一般歐美文學而論，小泉八雲的話似乎未能言中。然而，在近代中國這一預言卻成了現實。小品散文在30年代的中國迎來了輝煌與豐饒的季節，而在七十年後的今天，人們仍能享受當年播種的恩惠²⁸。

註釋

1、2、3 Jonathan Cott, *Wandering Ghost: The Odyssey of Lafcadio Hearn* (New York: Knopf, 1991). 日文版為真崎義博譯：《さまよう魂》（東京：文芸春秋，1994），頁21。

4 《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一號，頁94-95。

5 《ラフカディオハソ・ハーソー著作集》，第五卷（東京：恆文社，1988），頁112。

- 6: 22 Lafcadio Hearn,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Lafcadio Hearn*, ed. Elizabeth Bisland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 Co, 1906), 377; 297.
- 7 Elizabeth Stevenson, *Lafcadio Hearn* (New York: Macmillan Co., 1961), 149.
- 8; 9; 10; 11; 13 Lafcadio Hearn, *The Japanese Letters of Lafcadio Hearn*, ed. Elizabeth Bisland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 Co, 1910), 61.
- 12 《學衡》，第二十八期，復刻版（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24年2月。
- 14 薩摩雄次編：《辜鴻銘論集》（皇國青年教育協會發行，1941），頁10。
- 15 Lafcadio Hearn, *Kokoro*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 Co, 1896), 205–206.
- 16 陳子善、張鐵榮編：《周作人集外文》，上集（海口：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5），頁242。
- 17 周作人：《周作人日記》，魯迅博物館藏影印本（鄭州：大象出版社，1996），頁428、434、435。
- 18 周作人：《談虎集》，合訂本（長沙：嶽麓書社，1989），頁15。
- 19 Lafcadio Hearn, *In Ghostly Japan, The Writings of Lafcadio Hearn 9*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 Co, 1922), 309.
- 20 周作人：《藝術與生活》，合訂本（長沙：嶽麓書社，1989），頁111。
- 21 開明：〈生活之藝術〉，《語絲》，第一期，1924年11月17日。
- 23 帕金斯編寫的〈拉夫卡迪奧·赫恩文獻目錄〉對小泉八雲的著作以及世界各國的譯本做了詳盡的調查。翻譯包括十數種語言，有日、中、德、法、瑞典、丹麥、芬蘭、西班牙、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俄國、荷蘭、希臘、依地語。中譯本收入《生命與書籍》（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7，筆者未見）、《西洋文藝論集》、《日本與日本人》、《文藝譯》四種。Percival D. Perkins, Ione Perkins, *Lafcadio Hearn: A Bibliography of His Writings* (1934; reprint, New York: B. Franklin, 1968), 177–78.
- 24 《奔流》，第一卷第八期，1929年1月。
- 25; 26 朱光潛：〈小泉八雲〉，載《孟實文鈔》（上海：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6），頁81；94。
- 27 同註5書，第九卷，頁118。
- 28 1994年，百花文藝出版社推出的《外國名家散文叢書》中包括一本《小泉八雲散文選》。譯者孟修就是數十年前受過小泉八雲影響熏陶的文學青年。在〈譯後記〉裡，譯者寫道：「我現在還忘不了他是如何深入淺出地把我帶進英國浪漫派詩歌的美麗意境的。」90年代以降的讀書、出版界的狀況又顯示了散文隨筆的隆盛，不過這似乎已超出了本文探討的範圍。

劉岸偉 1957年生，北京人。現任教於東京大學，從事比較文學研究。著作有《東洋人的悲哀》、《明末的文人李卓吾》、翻譯《利瑪竇傳》等。